

## 晃動在自由冒險中的背影

◎ 于奇智

法國「新哲學」領袖雷威（Bernard-Henri Levy, 1948- ），是一位揭示法蘭西思想意識的人、猶太人團體的代言人、左派份子、自由悲觀主義者。他在1991年出版了《自由的冒險歷程》（*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é : une histoire subjective des intellectuels*），宣示了他的知識份子主體史觀，立即轟動法國。該書中文版已由曼玲和張放翻譯，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作者原本編導一部同名電影，後來寫成此書，實現了圖像和文本的結合。這是一種立體創作。本書以「巨大的希望」起筆，經「輕蔑的時代」、「幻滅」，到「先知者的末日」落筆，向我們放送著一個又一個偉大的背影，展現著二十世紀法國知識份子為自由而冒險的輝煌歷程，突顯知識份子的社會價值。對我們來說，這些背影中的絕大多數已背向我們走進了歷史，一去不復返。

可以說，雷威構思本著的過程也是一次冒險歷程，歷時五年，調查、探索、訪問、旅行、分析、反思……，在歷史與現實、文獻與談話、死人與活人、圖書館與社會、頭腦與書本之間奔跑、工作。於是，他用獨特的構思寫出了一部與以往不同的法國知識份子史，為我們磨出了一面嶄新的思想史之鏡。

這面鏡子充滿誘惑。事實上，二十世紀法國所有知識份子的身影都納入其中，儘管在書中還有許多人物沒有出現，也許他們排列在隊伍的後面。知識份子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自由而冒險的行為。自由！冒險！如此而已。雷威熱情地陳述「自由的冒險」。自由冒險意味著希望、輕蔑、幻滅和末日恐怖。

二十世紀80年代的法國，巴特（Roland Barthes）、薩特（Jean-Paul Sartre）、阿拉貢（Louis Aragon）、福柯（Michel Foucault）、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這些思想大師一位接一位地倒下了，猶如山崩地裂，令人不安。薩特死後，人們還沒緩過氣來，另一震驚人間的事件發生了：大師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因抑鬱發作而勒死了他的妻子埃萊娜！阿爾杜塞病了！阿爾杜塞瘋了！大師怎麼啦？他的弟子和追隨者都難以承受這一重擊，然而這的確是明擺著的事實。自此以後，伴隨著他的永遠是疾病—醫院、孤獨—老人院、靜默、空洞的軀體、靈魂的黑夜、世紀的黑夜……。唉，時代的思想大師！

這一代思想大師是自由冒險的最佳見證人，有著太多的秘密。雷威關心的是何以從知識份子的秘密出發進行自由探索。他把我們引向莫斯科、阿爾及爾、柏林、布拉格、北京……，把我們引向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知識份子」概念的發生史（德雷福斯案引起人民強烈不滿，導致民主力量與法國當局間的衝突，使本具侮辱性的稱謂「知識份子」上升為一面旗幟、一種榮耀、一種象徵），把我們引向數目驚人的知識份子群落（新型人物、詩人、作家、畫家、教授），把我們引向為價值而戰的行列（知識份子成為世俗空間與空想天國間的橋樑，成為正義、真實、善良與國家間的中介）。知識份子開始腳踏兩隻船：寫作與戰鬥，奔忙於

哲學、神學、政治和媒體之間。這代知識份子的歷史早在十九世紀末就開始了，是前輩知識份子的接班人，而在臨近二十世紀末之際，他們已經消逝或正向消逝的終點靠近，把未竟使命賦予給了年輕一代。

新小說派代表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西蒙（Claude Simon）是本書的啟場人物，原本置身於戰鬥之外，但後來為了戰鬥，不得不棄筆從戎，擔負社會責任，成為騎兵，是屠殺中的倖存者。他認為寫作就是參與，作家的責任是盡可能寫出最好的文學，如同學者應盡力做出最好的學問。作家應不停地寫作，只有死亡才是了結寫作戰鬥的最後手段。

在西蒙眼裡，馬爾羅（André Malraux）是個平庸之輩，雷威卻是馬爾羅的崇拜者。馬爾羅是本書的重點人物，作者不惜筆墨。這不奇怪。馬爾羅迷戀冒險，令人著迷，恰恰對作者胃口。馬爾羅何許人？他生於1901年，死於1976年。其正式身份是法國作家。他除了寫作外，還從事社會政治活動。1927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同年廣州起義時訪問了中國。小說《征服者》反映亞洲人民的覺醒，《人類處境》描寫上海四一二大屠殺，《希望》則反映了他親身參加的西班牙內戰。還有作品《反回憶錄》、《蔑視的時代》、《沉默的聲音》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爾羅曾領導阿爾薩斯游擊隊。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執政期間，他擔任新聞部長和文化部長。他在西班牙飛行中隊的某些戰役中發揮過關鍵作用，作為一位作家獲得了戰爭體驗，並夢想成為戰爭領袖。當年在馬爾羅身邊工作的人、飛行中隊最後的倖存者諾通（Paul Nothomb）認為，馬爾羅神氣而有才華，舉止非凡。馬爾羅就是馬爾羅。他所領導的西班牙空軍中隊人員都是左派份子，處於無政府狀態。中隊運作不靠任何紀律、任何強制，其成員充分體驗了自由。他還當過前機槍手，這種躬親實踐是一種冒險。他帶領空軍中隊去西班牙的目的是革命，至少使革命成為可能。他與同時代的一些作家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奧維爾（George Orwell）、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之間的立場相反。他比他們勇敢，但沒有他們清醒。馬爾羅的一生充滿傳奇、神秘、冒險色彩，猶如歷史畫面中的陰影。

後來的馬爾羅背棄了青年時代的理想。他經過苦心經營，已成為勇士、紅人、上校、演說家、抵抗戰士、戰鬥員、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識份子的化身。最令人熟悉的形象是出色的小說家、偉大的反叛知識份子。可是，他當上了政府部長，參加了法蘭西人民聯盟。他改宗了。這引起了失望者和憤怒者的咒罵：惡棍、變節者、法西斯份子，但對馬爾羅來說，只過知識份子生活是不夠的。人的一生就是經營光榮的歷史。馬爾羅十分明白，二十世紀的歷史是民族力量與國際主義力量對峙的歷史，於是，他冒險地選擇了通往國際主義英雄的道路。然而，他的算計出現了嚴重失誤。共產主義首先是民族的，繼而才是國際的。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民族優先原則。他為自己塑造的國際使者形象實際上是冒險的影子，在國與國之間奔波忙碌。戰爭讓他看到了和聽見了一切可怕的冒險故事。他與戴高樂結好，把自己視為詩人、奴僕、作家，而把戴高樂看作君王、領主、偉人。在法國，多數作家是失敗的政治家（作家的失足），而多數政治家是失敗的作家（政治家的失足）。知識份子不是當政治家的料，政治家不是當知識份子的料，否則，必然都是半瓶醋。行為的作家與著書的政治家之間難以存在永久和諧，只能以一個領域的失敗換取另一個領域的勝利。知識份子最終發現自己選定的對象的兇惡面目時，會感到失望和痛苦。但一切已成定局，裂痕和傷口都有了，夠痛的。

法國超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者，是自由冒險歷程中湧現出來的又一大奇跡。當時，知識份子加入共產黨成為時髦，超現實主義者中不少人都是共產黨員，後來又退出。雷威指出，勞動社會學創始人納維勒（Pierre Naville）是超現實主義的最後見證人。超現實主義陣營擁

有一批著名人物：佩雷（Benjamin Péret）、布勒東（André Breton）、阿爾托（Antonin Artaud）、阿拉貢、洛特雷阿蒙（Isidore Lautréamont）、納維勒、貝爾尼埃（Jean Bernier）、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等等。其中，布勒東居於領導地位，既嚴肅又好諷刺，不喜歡膚淺的玩笑，好擺權威架子。儘管納維勒與布勒東之間存在嚴重的情感化分歧，還是把友誼關係保持到底，但與阿拉貢等人卻沒能保持良好關係，不再來往。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細節觀看到他們之間的矛盾關係。納維勒與布勒東發生衝突後有十年未見。有一天，他們在巴黎一家咖啡館的小型會議上相見，幾乎相對而坐。當對一項決議進行表決時，差不多大家都舉手表示同意，只有布勒東一個人舉手（其實是舉起了一個指頭）表示反對，卻一言不發便起身走出了咖啡館。這是一個多麼滑稽的背影。這個背影是矛盾、主宰、權力、立場、信念的象徵。

布勒東絕不允許任何人做有損超現實主義運動的事情，不喜歡別人如巴塔伊具有搖擺不定的危險信念，也嚴格要求自己絕不走回頭路，而阿托爾更是一個極端的超現實主義者。他們有著明確而堅定的原則和立場。超現實主義者之間常常互相詛咒、侮辱、謾罵、抨擊、貶斥、爭吵，充滿污垢，極盡粗言之能事，把口頭鬥爭和粗話推向崇高的文壇。作為超現實主義運動的領袖，布勒東開除了與己不和的人：納維勒、貝爾尼埃和巴塔伊（他們是孤立地進行愚蠢的文學冒險之徒）。超現實主義者必須始終如一，必須具有完整的品格、全面的身份。他們對本書作者雷威一代影響巨大，成為他們精神上的同代人。超現實主義者具有好戰精神，把不同路線上的人交織在一起。雷威指出，未來歲月的任務在於幫助一種現代精神的湧現，它將絲毫不依賴前衛派的主題、措辭、非思想手段。超現實主義對冒險的貢獻之一是樹立宗派精神，主張集體冒險。超現實主義者信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但就群體觀念而言，倒更像榮格主義的信徒。他們自以為是創造與天才相結合的浪漫主義者，但事實上實行恐怖的專制主義和好戰策略。在今天看來，超現實主義運動是一場文學惡夢，是一場幽靈戰爭，是荒唐、混亂、矛盾、惡毒的組合運動，因為它對思想推行警察式管制。讓我們忘記它吧。

薩特這個人怎樣？薩特的情況相當複雜。在薩特那裡，兩種矛盾的象徵並存：知識份子的完美無缺的象徵和知識份子的蒙受恥辱的象徵。他既是最好的人又是最壞的人，既是最光榮的人又是最可恥的人。他因錯過了法國抵抗運動而在自己提出的介入理論領域做了許多事情，甚至過多。從德國戰俘集中營回到了法國，過上正常生活，當時的薩特還不是偉大的薩特（《存在與虛無》的作者），而是渺小的薩特（只是《噁心》和《牆》的作者），他的名字還沒有分量。儘管他一回到法國就尋找他的朋友，並把他們聚集起來，打算大幹一番，最後還是白幹了。在偉大的馬爾羅面前，他只是個天真的小夥子或幼稚的童子軍，被認為是猶豫不決或等待時機的晚期抵抗份子。會見馬爾羅後，只好羞愧尷尬地上路回家。作者認為，薩特是個野心家，在利益與信念發生衝突時，會倒向敵人一邊，比如出現了著名的《蒼蠅》事件，這一事件無疑是薩特一生的污點。雷威對薩特的再思是很有意思的。這裡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知識份子，薩特是否對社會政治負責？或者說，對知識份子來說，介入應當是理論上的還是實踐上的？法國知識份子一直有著社會政治敏感性，他們把自身視為「社會中堅」，對社會肩負啟蒙的使命，在理論上啟蒙，在實踐中適應。啟蒙與適應使介入有了雙重含義。他們易於生氣、激動，積極抗議請願。只要他們發表聲明，整個世界都會動起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女人在知識份子史中的影子。即使女人不從事寫作，不成為作家，也會成為男人和男作家的圖騰。這種圖騰是建立和維繫社團圈子的繩索，進而把男人們緊緊拴住。佩尼奧（Colette Peignot）、奴蕙（Nusch）、嘉拉（Gala）、西蒙娜·布勒東（Simone

Breton)……就是這樣的人物。她們與男人(比如貝爾尼埃、蘇瓦林[Boris Souvarine]、巴塔伊……)狂熱地玩一種多角戀愛遊戲(也是一種自由的冒險),身兼數職,善於建立關係網,善於調停和選擇,喜歡聯繫、接通和交流;她們本就是一張巨網,各自聯繫著一個完整的世界,處於男人們的邊緣和中間地帶;她們是心靈上和風格上的世界主義者、磁鐵、舷梯、衛星、管道、新聞發布者,容易打通各種關節;她們還是世界、宮殿、城市、普遍和絕對,積極參與知識份子的歷史冒險,可以說,女人是冒險的真正源泉,是冒險家手中的王牌。這些正是女人的魅力所在。男人則通過女人進行較量、形成對峙、發生爭吵、出現爭奪。哪裡有女人,哪裡就有較量、對峙、爭吵和爭奪。男人與女人彼此具有天生的欲望,人是欲望機器。男人可以拼命追求女人而使其成為冒險伴侶。只要女人一出場,男人的全部冒險史就行將完成。許多作家為女人寫作,依憑女人安身立命,因女人而寫出了傑作,如費茲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夜溫馨》(*Tender Is the Night*)、布勒東作品、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作品、喬伊斯(James Joyce)作品、馬爾羅作品……,他們的生活也因女人而大放異彩。即使女人不動一筆一字,在文學中的地位也會不朽;然而,女人一旦委身於作家就面臨著多種結局:或被娶,或被棄,或被詐,或被搶,或被罵;她們在作品中的名字和身心形象已經被幻化、虛化了,不能獲得真實的再現;作品也不是她們的傳記,她們不夠傳主的格。冒險讓女人付出巨大代價,女人因此造成自身的不幸。

政治性自由冒險把知識份子引入「出」與「不出」的矛盾境地。自由冒險意味著知識份子必須無可選擇地參與時代,投身政治,必須忘記所知的一切,如德蘇條約、集中營……,這是為了某種形勢的需要。因為他們認為政治事務成了唯一有價值的事情,所以必須全心全意為政治服務。為此,他們以前確立起來的原則頃刻化為烏有。不過,他們一旦成為戰鬥作家(政治作家),其想像力、創造力、智慧和才華就會蕩然無存。政治事務偷走了作家的時間。時間失去,年華飛逝。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們明知如此,卻執意想繼續當作家,只是勉強寫作而已。他們已經失去了寫真小說的權利和時間。最明智的選擇是退筆從政。作家在政治介入期的作品量少而質劣,介入期即作家作品的蕭條期。作家只有擺脫介入,才能恢復行使自己的完整權利,才能重返自由的精神領域。不然,時至晚年會真正感到氣怒和煩心。因為逝水年華永不復現,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業被延擱而終無實現之日,青春曾為政務而耗盡,中年和晚年悄悄來到了面前。人生充滿幻滅。

在政治冒險的苦樂園,阿拉貢是一個突出代表,代表一個自由冒險的時代。我們可以稱這個時代為「阿拉貢時代」。阿拉貢作為共產黨的偉大作家對法國產生過巨大影響。他的重大問題是共產主義問題,當然不是理論上的而是實踐上或政治上的問題。他在法共扮演了半個世紀的重要角色,這完全是他的肉體存在。作者關心的是,他做了甚麼事?想了甚麼事?能對此說些甚麼?這麼重要的大作家以法共為安身立命之所,這是難能可貴的一面。當然他經歷了不斷尋覓的冒險,由達達主義而超現實主義、無政府主義終至共產主義。二十世紀法國的大作家中許多人都在尋找「安居工程」,終於有一天他們找到了,就下決心定居下來,如馬爾羅象徵戴高樂主義,紀德(André Gide)即背叛者,加繆(Albert Camus)象徵正義,薩特象徵信仰,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只不過是個壞孩子。

在舉世聞名的阿爾及利亞事件上,不同的知識份子採取了不同的立場。雷威在書中主要舉出了社會學家阿龍(Raymond Aron)、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里亞克和加繆、以及讓松(Francis Jeanson)和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阿爾及利亞」這塊法屬領地(法國把它作為自己的海外省),被視為法西斯份子、貝當份子與其他壞人的雜居地。作者把一位法國小學教師(小知識份子)莫諾羅(Guy Monnerot)

因起義而死視作一種象徵。莫諾羅遠赴阿爾及利亞傳播法國文化，成為法國自由、民主、人道的「神秘英雄」、「神聖人物」。當時眾多的法國知識份子認為，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鬥爭就是保衛普遍民主的意義。比如原反法西斯知識份子警惕委員會成員里維（Paul Rivet）撰文指出，如果阿爾及利亞脫離歐洲，就會給它的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和衰亡。德拉維涅特（Robert Delavignette）是典型的殖民地人道主義者。最可憎恨的是完全由殺手組成的秘密軍隊組織，它常常在「抵抗運動」的大旗下展開其種種活動，實際上犯了不少血腥罪行。大旗與罪行使歷史成為一個遠比人們所想要複雜得多的東西。錯綜複雜的歷史會變得模糊不清，好人與惡人的界線在歷史中也無法確定。歷史一旦落入惡人之手，就會成為其藉口。惡人必然會在歷史檔案中抹去他們曾經幹過的形形色色的壞事，甚至粉飾他們對於社會的影響和貢獻。在歷史簡單主義者看來，阿爾及利亞戰爭只不過是一場善惡之戰。

阿龍對阿爾及利亞事件採取了甚麼立場？介入便是阿龍的立場。他被捧為「介入模範」。他的這一立場選擇的確是一種英雄行為。他與薩特達成共識。他既不喜歡造反，也不對阿爾及利亞社會主義打賭，也不把革命病毒帶到法國本土。他的介入立場源於一種理論分析、一種經濟考慮，也源於歷史哲學的思考。他認為，使別國殖民化是很花錢的事情，與其這樣，不如把錢用於法國本土的發展。因此，他必須盡快離開阿爾及利亞。對於政治家的政治失足，那些介入社會活動的知識份子要負很大的責任。處於常識環境和事實環境中的知識份子應當對人類、社會、歷史和宇宙負責。當時的歐洲人流行一個說法：不是和共產主義一起拯救這個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義一起毀滅這個世界。對此，知識份子必須作出痛苦的抉擇。於是，有的要共產主義，有的要法西斯主義，有的則都想試一試。天真的知識份子易於邁入歧途。對阿龍來說，不論是思想上還是做人方面，人們都把他視為道德化身。他時刻保持著非凡的理性冷靜，曾想與他的小同學薩特展開對話，但後者總是迴避。他有三部代表作存世：《歷史哲學引論》、《國家間的和平與戰爭》和《克羅茲威茨》。

莫里亞克雖然在1952年聲明過他將把所獲諾貝爾文學獎獻給為正義、尊嚴和自由而進行的漫長而艱苦的鬥爭，但他想的是摩納哥，而非阿爾及利亞。當然有跡象表明，他也極其關心阿爾及利亞，因為他認為法國對阿爾及利亞實況負有不可減輕的罪責。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的態度又如何呢？加繆在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報告會上的插話頗令四座驚詫。他說：「在正義與我母親之間，我將選擇我母親。」這是一句沒有事先出現在講稿裡的話。為了堵塞找碴者的嘴，不得不如是說。當時在座的人們以為這是加繆的應急性幽默，因而給予支持。這句話得以廣為傳誦。加繆說出這句話時的表情和造成的場面一定美極了。這充分表現出了他固有的勇敢。讓松覺得加繆的話相當可怕。事實上，加繆一直在揭露貧窮、酷刑和殖民主義。他的立場不止在書裡，更在大街上。難怪人們說，加繆是正義的象徵。讓松和布朗肖也都有各自的明確立場，他們的生命都隨著事件的結束而結束了。

知識份子是有學問的反抗者。他們要麼醒世樂觀，要麼粉飾悲觀。雷威也自認為是正統派、隨大流的人、講究禮貌的平民，他曾是極端結構主義者、力做有學問的反抗者、各種政治語言的宣傳者，也是阿爾杜塞、福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心中的狂熱信徒。阿爾杜塞等思想大師對雷威一代產生過巨大影響，並使他們迅速成長起來。法國知識份子群體後繼有人。

哦，我們還應提及福柯。在當代法國知識份子中，福柯是不應該被忘卻的。福柯早就被奉作「我們這個時代的康德」。後期福柯的主要問題是尋找真實的政治。他認為，真理的立場即風格的立場與生活的立場。這位新康德在法國本土總過著不自在的生活，頭腦裡和心靈深處一直存在著離鄉情結，總想過一種異鄉生活，以至打算去舊金山定居。從福柯的實際生活經

歷中，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一點。究竟甚麼是福柯所謂的「真實政治」？在他看來，革命欲望當時已成了問題，而權力和它構成的關係才是生產性的，權力的效應與真理的產生一直是纏綿於他心中的問題。權力與真理被人們用來表明頭腦中發生的事情及其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關係。權力既最顯又最隱，開始於經濟對社會的決定作用，存在於國家機器和國家形式之中。福柯試圖尋找到這種權力。權力中未澄明的真實政治（政治真相）是現實社會疾病的潛在誘因。因此，只有真正尋找到這種潛在誘因，才能根治社會疾病。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兩面都是鋒利的。自十九世紀以來，哲學就不斷接近「現時問題」，福柯正是在努力接近它。現時既是政治的又是歷史的，它是政治的歷史，是歷史的政治，是歷史在現實政治上的內在展開。它表明了我們的目前狀況和目前發生的事件的統一。

知識份子的革命欲望主要表現為吶喊，從事非政客式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嚴格地講，這是一種低下政治或準政治實驗。知識份子往往腳踏兩隻船：創立革命理論與從事革命實踐。這確立了知識份子的基本身份：甘願為自由而冒險的在者。

隨著靈魂與世紀的黑夜降臨，法國知識份子的二十世紀就這樣結束了，自由冒險就這樣結束了，出現在我們身後的是一群群晃動著、扭曲著、高矮長短的背影。筆者在本文中只能向讀者展示所有這些背影中的幾個片斷、一些形象、部分面孔，它們足以引起我們的聯想。若讀者欲進一步穿過二十世紀法國知識份子的歷史，就最好閱讀雷威的書了。

《自由的冒險歷程》是一部法國二十世紀知識份子（還不是所有的）的澄明史、一部當代法國思想史，其背後還有一部未在本書中澄明的歷史（也許已被別人書寫出或正被別人書寫著）。澄明的背影與未被澄明的背影都總是同時存在著，也同時晃動著。我們觀看著。自由與冒險成就了知識份子，引發了種種知識份子事件，也確認了其作為為自由而冒險的法蘭西知識份子的身份。他們的大背影早已混入普通人群之中，不見了，但永遠留在雷威這本書裡。

于奇智 法國普羅旺斯大學哲學博士，華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教授。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2年6月號總第七十一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